

CHENQIAOYI
FANGZHI
LUNJI

陈桥驿 著

陈桥驿方志论集

杭州大学出版社



陈桥驿方志论集

陈桥驿方志论集

陈桥驿方志论集

CHEN QIAOYI
FANGZHI
LUNJI

012108

98
K290-53
12

CHENQIAOYI FANGZHI LUNJI

陈桥驿方志论集

陈桥驿 著

杭州大学出版社

C

471005

陈桥驿方志论集

陈桥驿 著

*

· 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天目山路 34 号)

*

杭州大学出版社电脑排版部排版

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杭州市余杭人民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16.5 印张 420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 1 版 199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3000

ISBN 7-81035-825-1/K·043

定 价:20.00 元

序

我不是方志学家,生平并未系统地研究过方志学这门学问,只是从小从我祖父的藏书中看到过许多方志,后来发现,这类文献在地理研究中很有用处,才开始加以重视。50年代后期,由于带领地理系学生进行野外实习,就为他们开设了一门方志学的选修课。当年曾经听课的侯慧萍副教授不久前撰写了《陈桥驿与地方志》^①一文,说到这门选修课的内容是“用新的观点和方法,解释、分析和利用旧方志”。这或许过分夸张。当年,我其实是抱着实用观点,主要是让学生在出奔野外以前的室内资料检索阶段中,也能注意一下当地的志书。不过要在课堂上讲一门课,就不可能完全讲与野外实习有关的实用部分,必须拼凑一点所谓理论的东西。于是我才查阅了诸如“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之类的说法,因为我早已知道,把某一种体裁的六朝地方文献称为方志,那是在《水经注》的记载中才第一次出现的。

方志学是一门学问,虽然我对此未尝钻研,却也小有兴趣。据梁启超在其《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说:“方志学之成立,实自实斋始也。”^②按章学诚的方志学,大概始于他的《修志十议》,此文末云:“甲申冬杪,天门胡明府议修县志,因作此稿,以附商榷。”^③这是他参与修纂乾隆《天门县志》前的作品,

① 《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2期。

② 《东方杂志》21卷18期,民国13年。

③ 《章氏遗书》卷十五《方志例略》。

甲申是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当时他27岁,则这门学问从建立至今,已有230年历史。在这200多年中,方志学家与方志学著述纷纷登场,诸如瞿宣颖的《志例丛话》与《方志考稿》甲集、李泰棻的《方志学》、黎锦熙的《方志今议》、傅振伦的《中国方志学通论》、唐祖培的《新方志学》、王葆心的《通志集议》等等,不胜枚举。而唐祖培于抗日战争期间在山西大学史学系,胜利后在湖北师范学院史地系均开设方志学课程,使这门课程进入了高等学府。在最近十多年来的修志高潮中,更是风起云涌,气象万千,特别是老一辈专家傅振伦先生赠我的《傅振伦方志论著选》,后一辈专家仓修良教授赠我的《方志学通论》和《文史通义新编》,使我受益非浅。

对上述各种方志学著述,我虽然都作过涉猎,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对于这门学问,我至今仍未入门。这些著述提出的许多理论和学说,有的分异,有的雷同,有的似同而异,有的似异而同,我颇感无所适从。在有关这方面的千言万语之中,使我服膺勿失的,大概就是章学诚在《记与戴东原论修志》中的一句:“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也。”^①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提及:“然其间能认识方志之真价值,说明其真意义者,则莫如章实斋。”我不知梁氏表彰的章学诚对方志“真价值”的认识,是否即是“将求其实用也”。

我之所以服膺章氏此言,完全是从自己出发,因为我是一个方志的用户,我为地理系学生开设方志学课程,目的也是为了让学生在研究工作中利用方志。我所有求于方志者无非资料,这或许就是我在方志学理论上难获长进的主要原因。特别是旧志,其整存或残存而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所著录的有8000余种之多,而从六朝以至宋元的亡佚古志为其他古籍所引及的为数亦夥。对于这样一大宗文化财富,我认为利用其资料实比探索其理论更为重要。因

^① 《章氏遗书》卷十四《方志例略》。

为旧志的时代不同,格局不同。六朝以前虽早有地方文献,但作者并无方志概念。方志一词至六朝始出,但六朝方志篇幅短小,与宋代方志绝不相类。北宋盛行图经,体例又经一变。直到南宋,方志的体例才基本定型,这种体例并为元、明、清各代所继承。在此复杂多变的过程中,寻求一种人人皆能接受的理论,或许并非易事,而且也没有必要。若干问题,有时言人人殊,例如《四库提要》列方志为史部地理类,在一个地理学者来看,这是理所当然。但李泰棻却认为“谬误已甚”^①。又如纪昀为嘉庆《安阳县志》作序,言此志“以康氏《武功县志》、韩氏《朝邑县志》为椎轮”而备加称赞。李泰棻也认为《朝邑》、《武功》等“七志”,“夙负盛名,修志家辄奉为矩矱者也”^②,但章学诚在其《书朝邑志后》中却说康书“疵谬百出”,韩书“更不可以为志”,康、韩二志,“作者所不屑道也”。^③又如黎锦熙论方志资料:“一切材料,皆有来源,摄入篇中,即非原文,必注出处”^④。言必有据,这当然是做学问的人应该恪守的准则,但我看眼下许多新修方志,对此都未遵循。由于不少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至今都不曾统一认识和普遍使用,所以有人认为方志学不是学问,这当然言出偏激,但或许可以说明,这门学问尚未成熟。而在另一方面,方志拥有大量各类资料,长期来为许多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所利用。近人胡乔木指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⑤。对于地方志的性质,议论多年,说法纷纭,我认为胡氏所云,真是一语中的。

既然是“资料书”,其主要作用,就是提供资料。对现在大家说的所谓“资治、教化、存史”一类的话,我并不反对,但这只是一种宏

① 《方志学》第15页,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下同

② 《方志学》第19页。

③ 《文史通义新编》外编六。

④ 《方志今议》,商务印书馆。

⑤ 赵庚奇编《修志文献选辑》,燕山出版社1990年版。

观概念。要收到这六个字效果,首先也是提供资料。地方志的资料是五花八门的,地质学家查当地的某一地层,生物学家查一种地方植物,经济学家查某一年的当地物价,历史学家查某一乡村的一块碑记,考古学家查当地出土的某一文物。但经济学家不懂得地层表,历史学家不认得拉丁文二名法,而生物学家又毋需过问当地物价。所以这种“资料书”的资料,是为各行各业提供,没有人能通读这种“资料书”,当然也没有通读的必要。所以它实际上是一种记载地方资料的工具书。

“资料书”而冠以“严肃的、科学的”,这当然是对当今新修方志的要求。对于大量旧志,其中有许多既不“严肃”,也不“科学”,但它们也是“资料书”,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包括其中一些我们现在视为糟粕的东西。例如寺庙志、列女传等,在今天的方志中当然不会再设这样的卷篇,但旧志中的这些卷篇,对于我们查索古代的饥荒灾异,有时却能起重要作用。陈正祥先生利用旧志中记载的蝗神庙、八蜡庙、刘猛将军庙等的分布,研究明代华北蝗灾发生的频率,获得了出色的成果^①。我自己在研究工作中得益于旧志的也很多,侯慧彝副教授在《陈桥驿与地方志》一文中已经举了若干例子,我在此就不再赘述了。

最近十几年来全国掀起的修志高潮,当然是一项令人高兴的重大文化事业。一切都发展得差强人意,成果也十分丰硕。对我个人来说,感到唯一有点意见的是志书在字数上的限制。1985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第二章《志书体例》第十五条说:“一般情况下,县志以控制在30万至50万字左右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万字至四百万字左右为宜,省志最好控制在1000万字以内。”这样的字数控制,实际上与“资料书”的说法是矛盾的。在中国的旧志之中,民国《鄞县

^① 《中国文化地理》第50—58页,三联书店1983年版。

通志》是非常著名的一种,我曾撰《民国鄞县通志与外国汉学家的研究》一文,说明这部长达 550 万字的县志,是如何受到外国汉学家的赞赏和重视。我曾以日本近年新修的志书《广岛新史》与中国近年新修的《慈溪县志》作了比较研究,前者对广岛市的每 1 平方公里土地,平均有 11.8 万字的记述;而后者对慈溪市的每 1 平方公里土地,平均只有 0.13 万字的记述。尽管在我国的新修志书中,《慈溪县志》是属于优秀的一种,但是从资料的角度来说,与日本的方志相比,未免相当落后。在这方面,凡是利用方志做学问的人,大家都有同感。方志的可贵在于资料,方志的生命力也在于资料,在近年新修的地方志中,我也看到过一些政府公报式的、有骨无肉的作品,对于这样一类志书,它们的实在生命,或许在首发式以后就告结束。

几年前,我曾给《石家庄史志》的编辑梁勇先生写过一封信,说到:“旧方志的主要市场是学者从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可以举出大量成果来。新方志的主要市场,到几百年后回过头来看,恐怕也多是如此。”我当然不想否定“资治、教化、存史”的说法,但是这六个字毕竟太抽象,拿不出具体的成果来。很有一些人害怕方志字数太多,篇幅太大,这些人当然不曾拿方志做过学问,其实也是杞人忧天。的确,古代的方志是很短小的,我的一位日本朋友秋山元秀教授写过一篇《中国方志论序说》^①,他把《禹贡》也作为中国古代方志。《禹贡》记载了九个州,一个州要抵现在几个省的地面,但只用六七十字。六朝方志记一个县就用几百或上千字。宋代方志记一个府有达几十卷的。这是因为物质条件和人事条件都在不断发展,方志篇幅的扩大乃是势所必然。章学诚在《书朝邑志后》中有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古人以竹简为篇,简策不胜;……后人以缙帛成卷,较竹简所载为多;……近代则纸册写书,较之卷轴

^① 《东方学报》第 52 册,1980 年 3 月。

可增倍蓰。”我可以在这里再补充一句：“现代以电脑贮存资料，多多益善。”当然，收入方志的资料，仍然要有选择，并且经过鉴定和整理，不能滥竽充数。我的意思是，不要硬性限制方志的篇幅，使修纂者不得不因此放弃许多来之不易的资料，从而影响了方志的生命力。

前面已经说过我不是方志学家，而收入这本《论集》中的议论，多半是一个方志用户对方志的要求。方志实在是一种门类繁多的地方百科全书，而我所利用的和懂得的仅仅是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对于方志学家来说，我的这些议论不仅是班门弄斧，而且也是细枝末节。《论集》中也有一些是省内外若干通志和专志要我为他们的志书所撰写的序言。按眼下时尚，序言有官序与学序之分，官序居高临下，气势磅礴，而且语言高亢，一句可抵千言，显然不同凡响。我所撰者当然属于学序，自然免不了学究气，而且各篇之间又免不了有些雷同的套话。不过我还是尽量注意这些通志和专志的地方特点和专业特点，查索文献，加以考证，个人愿望很想通过序言，为这些通志或专志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增加一点学术气氛。不过由于水平所限，往往力不从心，也只好请读者谅解了。

《论集》最后加了一个《附录》，收入了侯慧彝女士的《陈桥驿与地方志》、周乃复先生的《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和周如汉先生的《两教授》三篇论文。侯女士是我50年代的学生，她在大学地理系毕业后，已经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30余年，著作甚多，成绩卓著。她在中国自然地理、地方志研究和地名研究等方面，都有较高的造诣，现在担任地理系区域地理教研室主任和研究生导师，作出了不少贡献。不过她撰写此文，难免杂有师生的感情在内，如前已指出的，评价事实，或许过分。我既不能拂逆她的厚意，也不便擅改她的文字，所以只好原文转载。周乃复先生是我的方志界朋友，他原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甚有建树，由于修志亟需人才而于80年代主持《慈溪县志》的修纂。《慈溪县志》是获得全国一等奖的

优秀方志,即此一端,就足见周先生在这方面的功力和贡献。继《县志》以后,他又精心构思,缜密作业,编辑出版了《慈溪市图志》,成为我国近年来地方志修纂的一种重要发展,厥功甚伟。他所撰写的这篇介绍拙作的宏文,除了对拙作的过奖我受之有愧外,在分析日本地方志的成就和论证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重要性等方面,其见解都是令人钦佩的。周如汉先生的大作发表在他的个人文集《霜林集——修志漫笔》^①上。他是新修《余杭县志》的主编,是一位成绩卓著的方志专家。同时又是我的同乡和我夫人的同学,我们之间讨论志书也已经多年了。文中记及的斯波义信教授是我的日本好友,是一位中国方志的大用户。记得那年我在国立大阪大学当客座教授,我的办公室就是他事前为我布置的,他用一整套台湾出版的《中国方志丛书》把我的房间挤得满满的。浙江省有两种流落在日本的孤本方志,即宫内省图书寮收藏的康熙《常山县志》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光绪钞本《新市镇再续志》,都是他帮助我引回的。我的《论集》收入这三篇论文,当然为拙著增加了光彩,谨在此向侯女士和两位周先生表示感谢。

陈 桥 驿
1996年10月

^①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4年出版。

目 录

地理学与地方志	(1)
地方志的学术性与实用性	
——兼论索引的价值	(11)
地方志与乡土教育	(16)
地方志与索引	(21)
关于地方志的附录	
——兼评新修《余杭县志》	(29)
致《石家庄史志》编辑的信	(35)
在桐乡修志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37)
绍兴修志刍议	(47)
给定海县志办的回信：“谈内外越”	
（附定海县志办的来信）	(57)
审阅《绍兴市志·政区篇》批注选录	(61)
《图经》在我国方志史中的重要地位	(68)
关于“沿革”和浙江省新修志书沿革卷篇的讨论	(77)
谈舟山异常天气的记载	(88)
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	
——中国慈溪市与日本广岛市的地方志修纂	(92)
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附件	(138)
中国方志资源国际普查刍议	(165)
北美汉学家论中国方志	(176)
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	(182)

《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	(191)
绍兴地方文献之稀见钞本	(203)
会稽二志	(208)
乾隆钞本《越中杂识》	(218)
《新市镇志》考录	
——兼介流落海外的光绪钞本《新市镇再续志》	(226)
从日本引回康熙《常山县志》纪略	(232)
《浙江省烟草志》出版有感	(237)
民国《鄞县通志》与外国汉学家的研究	(243)
对《淳安县志》稿的点滴评议	(247)
赞新修《淳安县志》	(256)
关于《安吉县志》卷首《县史述略》篇的讨论	(260)
开发海洋 利用海洋	
——评《普陀县志》	(267)
古志垂誉 新志辉煌	(273)
东阳的地方志修纂史与新修《东阳市志》	(278)
评《黄河志》分卷出版	
——兼建议增编《索引》	(282)
喜读《偃师县志》	(289)
关于“句”“勾”的通信	(298)
《浙江分县简志》序	(301)
《浙江地理简志》序	(304)
《浙江地名简志》序	(308)
《浙江灾异简志》序	(314)
《宁波市志》序	(329)
《绍兴市志》序	(335)
《德清县志》序	(340)
《长兴县志》序	(346)

《平湖县志》序·····	(351)
《新昌县志》序·····	(357)
《崇福镇志》序·····	(361)
《东浦镇志》序·····	(365)
《盛陵村志》序·····	(368)
《杭州市地名志》前言·····	(371)
《象山县地名志》序·····	(376)
《庆元县地名志》序·····	(379)
《常山县地名志》序·····	(382)
《龙泉县地名志》序·····	(385)
《遂昌县地名志》序·····	(388)
《丽水市地名志》序·····	(390)
《瓯海县地名志》序·····	(392)
《岱山县地名志》序·····	(395)
《绍兴地方文献考录》前言·····	(399)
《点校本越绝书》序·····	(404)
《会稽方志集成》序·····	(421)
从《越中杂识》谈浙江的方志(代前言)·····	(433)
影印《越中杂识》原版复印本序·····	(442)
《绍兴贤人志》序·····	(446)
《绍兴百贤图赞》序·····	(452)
《芋萝西施志》序·····	(456)
《方志刍议》序·····	(462)
《绍兴县交通志》序·····	(468)
《安阳市交通志》序·····	(476)
《慈溪盐政志》序·····	(480)
《慈溪市图志》序·····	(489)
《黄河人文志》序·····	(491)

《新昌地方史志丛刊》序…………… (494)

附录一 陈桥驿与地方志…………… 侯慧彝(497)

附录二 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

——读陈桥驿先生《中日两国地方志的

比较研究》…………… 周乃复(506)

附录三 两教授…………… 周如汉(512)

地理学与地方志^①

地理学与地方志有密切关系,这在我国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我国历史上大量修纂地方志始于六朝,从这个时代起,地方志就被认为是一种地理书。《隋书·经籍志》二在著录了如《洛阳记》、《三巴记》、《淮南记》等六朝地志 139 部后,卷末说明云:“齐时,陆澄聚一百六十家之说,依其前后远近,编而为部,谓之地理书;任昉又增陆澄之书八十四家,谓之地记;陈时,顾野王抄众家之言,作《舆地志》;隋大业中,普诏天下诸郡,录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以备地理之记焉。”

到了清初修《四库全书》时,地方志已经为数甚多。《四库全书》把地方志编入史部地理类,正式录入《四库》的,有从乾道《临安志》起的宋、元、明著名地方志 25 种及清畿辅和各省通志 14 种(地理类一),而《四库》存目的,则有明、清地方志 107 种(计地理类存目二,37 种;存目三,70 种)。由此可知,从六朝到清代,地方志都被认为是地理书,所以这种传统,在我国由来已久。

六朝地方志内容简单,一般都不分卷。但到了宋朝,地方志内容增加,志书从此分卷,各卷设有卷目,而地理开始成为卷目的名称。在现存宋代地方志中,最早以地理作卷目的,大概是嘉定《镇江

① 原载《中国地方志》1989 年第 2 期。

志》^①。此志卷一、卷二，卷目均作地理，卷六亦作地理，前后共有三卷。此后，嘉定《赤城志》设地理门三卷（卷一至卷三），咸淳《毗陵志》亦设地理三卷（卷一至卷三）。到了明、清，地方志中以地理为卷目的十分普遍，它们有的称为地理志，有的称为輿地志，其排列与宋代一样，往往置于全志之首。

如上所述，六朝地方志在后代的公私著录中都作为地理书，而宋代以后，地方志中又专设地理卷目，地理学与地理志之间的关系自不待言。而最近几年来，全国各地的新修地方志，也继承了我国旧地方志的这种传统，它们普遍以地理作为篇目或卷目，并且收入了大量的有关地理学的资料，丰富了新志的内容。

不过在这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讨论。从宋代以至明、清，地方志中的地理志或輿地志，其内容与现代地理学有很大差别。旧志中的地理，或者把它称为古典地理学，这种地理学的概念，用《历代地理志韵编今释》卷首李鸿章序言中的一句话就可说明：“夫輿地之学，乃读史第一要义”。这就说明当时的地理学，是历史学的一门辅助学科，目的是为了帮助读史。因此，它的内容是很狭窄的。如上述嘉定《镇江志》，卷一地理只有叙郡、子目两项，卷二地理也只有城池、坊巷、桥梁、津渡四项，卷六地理则仅山川一项。嘉定《赤城志》卷一地理门下有叙州、叙郡二项，卷二地理门下有城郭、乡里、坊巷三项，卷三地理门下有馆驿、桥梁、津渡三项，此外，它另设山水门，从卷十九到二十六，达八卷之多。咸淳《毗陵志》地理三卷，内容与《赤城志》相似，卷十五也另设山水一卷。说明宋代地方志的地理卷，内容无非是州郡沿革、城邑坊巷、桥梁津渡之类，甚至连山水也不在地理之内，如嘉定《剡录》、淳祐《临安志》、景定《建康志》、咸

① 嘉定《镇江志》与嘉定《赤城志》均设地理卷，前者修于嘉定七年（1214年），后者不记修纂年月，但卷末有嘉定癸未十一月既望郡人陈耆卿序，癸未是嘉定十六年（1223年），故嘉定《镇江志》修纂在前。